

諾貝爾文學獎 與

最近，國內出版社競相推出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，這對愛好世界文學的讀者，不啻是個拓展視野和胸襟的大好機會。因為，儘管這些作家的寫作態度各有不同，他們對人類苦難的感受、對人類摯愛的道德情操都是一致的；同時，他們的作品也都能反映一個時代人類的處境和前途，自有其深遠的意義和價值。

所以，毫無疑問的，諾貝爾文學獎在國際性的各項文學獎當中，其地位是無可匹敵；幾乎所有的國家或作家本人，對於得獎一事，莫不視為最高的榮譽。

但是，在「文學即政治」的俄國，每逢本國作家得了獎，總被認為是一種政治事件。除了一九六五年的蕭洛霍夫外，一九三三年的布寧、一九五八年的巴斯納特克、一九七〇年的索忍尼辛，他們的得獎幾乎都掀起軒然大波。

1.

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作家，是革命後流亡國外的布寧（一八七〇—一九五三）。他是俄國貴族階級的知識份子，對俄羅斯的傳統和過去，有着深切的懷念；對祖國的新主人——蘇維埃政權，却懷有恐懼感。

布寧早期的創作，大都是善感、哀傷、唯美的抒情詩。他的一些短篇小說，染有主觀的、宿命論的神秘色彩，大都以他熟悉的故鄉環境為主題。只有「鄉村」和「旱溪」兩篇小說，是現實主義的作品。

昉 吳

四位俄國作家

一九一五年，布寧不再以俄國人或俄國地區為背景，寫了一篇「舊金山來的紳士」，是他創作歷程一項成功的嚐試。它描寫一位美國紳士到歐洲旅行，因心臟病發作，病死在義大利的旅館中；他的屍體原船運回美國，船上依舊是燈紅酒綠、狂歌歡舞，船艙底下黑暗角落，放着裝有紳士屍體而塗上瀝青的棺材，形成一強烈對比。

一九一七年，俄國大革命爆發，布寧避居克里米亞；一九二〇年因激烈反對新政權而出走。流亡法國期間，他寫了許多哀傷貴族生的凋落，詛咒人生、讚美死亡的作品，像「米琪娜之戀」、「阿爾塞涅夫的一生」等小說，都充滿這類悲觀的情緒。一九三三年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

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布寧，在國際文壇上曾經激起不滿和質疑——為什麼沒有頒給聲名如日中天的高爾基或梅列柯夫斯基？布寧憑什麼得獎？

根據諾貝爾文學獎檔案顯示，讓一位俄國流亡作家得獎，並不是偶然的。原來，設獎人亞勒弗烈·諾貝爾的侄兒——伊曼紐·諾貝爾，在沙皇時代負責經營他叔父在俄國巴庫的油田產業，被革命後的新政權廢止。後來他不斷與俄國流亡團體保持密切聯繫，甚至鼓動法國知名文學作家推薦布寧角逐諾貝爾文學獎，無不有「公報私仇」的意味。而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一位反對俄國新政權的流亡作家，難免令人認為有某種政治因素。否則，以布寧那些貴族的悲觀和鄉愁、缺乏人道主義的作品，怎堪榮膺不朽的冠冕？

自布寧得獎後二十五年，即一九五八年，瑞典學院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巴斯特納克；但因作者考慮到俄國對此項鉅獎的看法，堅持留在自己所不喜歡蘇維埃制度裏，拒絕前往領獎，曾經造成轟動一時的「齊瓦哥醫生」事件。

巴斯特納克（一八九〇—一九六〇），出身於純藝術的家庭。他早期的詩作，受未來派的影響，艱澀難懂，無法為一般讀者接受，被批評為「太抽象」、「與人民生活脫節」。後來，為了迎合黨的文藝路線，曾經寫過不少闡揚革命精神的敘事詩。

史達林整肅文化作家期間，巴斯特納克緘默了一段日子，專門翻譯莎士比亞、歌德等外國作家的作品。所以，俄國年輕一代，只知道他是一位翻譯家。

直到史達林死後的「解冻」，巴斯特納克又恢復了寫作的信心。一九五六年，他寫完了「齊瓦哥醫生」，因內容涉嫌「誹謗」，不准在俄國出版，但在國外已獲得相當的聲譽。它描寫俄國各階層人民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二九年間，如何生活、戀愛、奮鬥和死去。作者努力要刻畫革命時代和蘇維埃制度的真實面貌，却不曾強調任何政治思想。許多人把它當作控訴

蘇維埃專政的反共作品，似乎值得商榷。誠如作者本人所強調的：「我的小說並不是用來表達政治意見的，我只想顯露真正的生活，我並不是一個宣傳家」。可能大家不瞭解，「齊瓦哥」的俄文原意，指活的、生的意思；作者引用為主角名字，另有隱喻作用。

這次，瑞典學院頒獎給巴斯特納克，理由若僅是：「他在當代詩以及偉大俄羅斯小說傳統二方面有卓越成就」，那就有失公正立場。基本上，巴斯特納克的詩作，正如同前面所述，仍存在不少瑕疵；而他的小說，也不及另一位俄國作家蕭洛霍夫的「靜靜的頓河」評價高。誠如斯拉夫文學專家卡爾格潤所批評：「在俄國作家當中，他是最沒有俄國氣質，最『西化』的一位——他早就因這種特性而屢遭官方監督機構的痛罵」。

所以，有人指責瑞典學院的政治色彩過於強烈，認為這次頒獎是一種反俄的「示威」，並不是沒有理由的。因為，一九五八年赫魯雪夫正挾「新共產國協」的餘威，改組最高蘇維埃，鞏固其領導的新政權。而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給俄國當局討厭的巴斯特納克，以反映蘇維埃制度生活悲劇為主題的「齊瓦哥醫生」

爲得獎作品，似有指桑罵槐之嫌。加上俄國當局所寄托的候選人——蕭洛霍夫落選了，難免落人口實，批評「頒獎不公平」，指其爲「政治陰謀」。

3.

在「齊瓦哥醫生」事件發生過後七年，即一九六五年，瑞典學院突然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蕭洛霍夫，理由是：「這位作家在那部關於頓河流域農村之史詩作品中，所流露的活力與藝術熱忱——他藉着這兩者在那部小說裏（指『靜靜的頓河』）描繪俄羅斯民族生活之某一歷史層面」。俄國輿論界齊聲讚揚，語爲瑞典學院這年的決定：態度公正、扶擇客觀。

蕭洛霍夫（一九〇五——），生長在頓河流域。一九二四年開始寫一連串的短篇小說——「頓河的故事」，以哥薩克的社會變遷和內戰在此地引起的動亂爲主題。

一九二八年，至一九四〇年，陸續發表前後四冊的鉅著——「靜靜的頓河」，再版一百次以上，銷售量超過五百萬部，被譯成世界十多種語言。一九三二年，爲配合俄國推行集體農場政策，他寫成了「被開墾的處女地」。此後，就很少有新創作。

「靜靜的頓河」，描寫哥薩克人的生活，以及俄國東南部頓河屯田區的傳統和習俗，時間涵蓋了一九一四—一九一七年的德俄戰爭，和革命後五年內的紅白軍內戰。它是一部類似托爾斯泰的「戰爭與和平」的作品，結構龐雜，把人物生平與歷史戰爭結合在一起；反映革命現實相當客觀，既不捧紅軍爲英雄，也不貶損白軍；文筆生動、情節自然，全無強行灌輸政治思想的企圖，反而同情哥薩克人生活環境和傳統社會遭到革命的破壞。正因爲如此，這部小說才容易欣賞，而獲得高度的評價。

面對蕭洛霍夫以「靜靜的頓河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，世界文學評論家似乎不曾感到絲毫的驚訝。索忍尼辛回憶錄有一段話最具代表性——「這簡直是集輕率匆忙、多年遲延、補償意味、讓官方（指俄國當局）高興於一爐，可說是政治氣氛最濃厚的一次了」。

記得，一九六四年沙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，曾經發表過一份聲明，公開指責瑞典學院的頒獎——「蕭洛霍夫和巴斯特納克兩人，瑞典學院竟先頒獎給後者；而且，獲得此獎之唯一俄國文學，竟是一部在外國印行，在其國內被查禁的書。此事殊堪扼腕。欲恢復

平衡，可以從反方向做相同的舉動……」。因此，一九六五年瑞典學院頒獎給蕭洛霍夫，只不過是彌補本身以前的錯誤。

至於一九七四年，索忍尼辛在蘇黎世發表一篇文章，指控蕭洛霍夫的「靜靜的頓河」，係剽竊哥薩克作家克利烏克夫的作品，由於年代久遠，缺乏具體證明，尚不足影響蕭洛霍夫在俄國文壇的地位。

4.

一九七〇年，在法國作家摩里阿克的推薦及奔走下，俄國數學家——索忍尼辛，以「癌症病房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。這次，瑞典學院甘冒「齊瓦哥醫生」事件重演，決定頒獎給一位俄國的「政治犯」作家，除肯定他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外，似乎也在擁護他的政治主張和反抗立場。

索忍尼辛，曾是忠誠的共產黨員，二次世界大戰在前線因戰功獲得兩次獎章。一九四五年與友人通信批判了史達林，遭受流刑八年，相繼在特殊監獄和政治犯收容所服刑。一九五三年出獄，終因罹患癌腫症，進入塔什干醫院接受治療。

一九六二年，在新世界雜誌發表小說——「伊凡

·丹尼索維奇的一天」。一九六四年參加列寧文學獎評審落選。一九六五年寫成了「第一層地獄」，但因內容不妥，稿本遭當局沒收。這裏，我們必須指出，這部小說係以特殊監獄為背景，描寫一千萬人以上「政治犯」——大都是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，每天面對帶刺的鐵絲網，妻子兒女不得見面，通信被禁止的不幸生活。雖然他們的待遇比其他勞改營囚犯好，「地獄」的性質仍然不變。

一九六六年，索忍尼辛又寫成了「癌症病房」第一部，翌年，第二部完成。小說的背景是塔什干醫院的病房，時間為史達林死亡前後；內容深具爆炸性，描寫病患的生活，附帶批判現實的黑暗，諷刺蘇維埃制度仿若癌症一般無可救藥。

基本上，索忍尼辛的作品主題，大都在揭發病重的俄國的罪惡，這是任何一位「政治犯」作家創作的共同出路。一九七〇年，瑞典學院頒獎給索忍尼辛，表面上讚揚他的作品道德力量，其實在聲援俄國境內被迫害者爭取人權的運動，這一種政治企圖，是不容掩飾的。索忍尼辛在諾貝爾頒獎的晚餐會致詞，可以獲得相對的印證——「……我不能不指出諾貝爾獎

的頒獎日期，與世界人權宣言紀念日的偶然巧合，是具有深遠的意義。每一個諾貝爾得獎人對於這種巧合，都不應等閒視之……。但願在今天這個宴會席上，我們不要忘記有許多的政治犯，正在用絕食來維護他們被蹂躪、被蔑視的人權呢！」

雖然，索忍尼辛在俄國當局的壓迫下，不能親自前往領獎，只用書面致詞；同時，最後一段話在晚餐會中被刪除了，但這一切都無損於他得獎的意義。

後來，索忍尼辛因偷運「古拉格羣島」到國外出版，被控叛亂，繼而驅逐出境，這種不幸的命運，是可理解的：畢竟任何抗議性的政治作品，都是賣命的事。

5.

總結四位得獎的俄國作家及其作品，我們應該有個認識：瑞典學院的頒獎，對俄國而言，都是具有政治因素的。不過，讀者若據以誤解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，那也就偏之一隅了。

誠如瑞典頒獎的審核標準所揭櫫的：不論國籍，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，且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文學作品，方能獲得此鉅獎。或許，這個界定多少會被打折扣，成為某種國際間的「配給」傾向，甚至因意識型態的好惡和國際政治的壓力，影響頒獎對象的選擇。但我們仍然對它寄予無限的信心，相信它獨有的評審權威。

對於俄國作家的處理態度，布寧的得獎，遺漏了高爾基；巴斯特納克的得獎，延誤了蕭洛霍夫；都是瑞典學院決定頒獎的疏忽和錯誤。至於蕭洛霍夫後來的補償性得獎，索忍尼辛及時的得獎，又證明了瑞典學院勇於擔當、重視人道的積極作風。

所以，俄國當局企圖用「政治」來掩蓋諾貝爾文學獎的正面「評價」，動機令人沮喪；相反的，瑞典學院若僅爲了反俄，而忽略俄國真正的優秀作家，作法也值得考慮。如何平衡這項闕失，尚有待努力。